



编辑故事

教育编辑偶尔跨界的收获

写这篇短文时,我正在台北,等待即将到来的台风“巴威”登陆。

这是我第三次来到祖国宝岛,第一次是2007年9月,第二次是2018年2月。每次来都有奇特和难忘的经历,这次是台风的来袭。

此番来宝岛,主要是想看看台湾的出版业是否景气,那些我认识的出版同仁是否还在,那些合作过的出版公司是否还在,那些逛过的书店是否还在。

见到的人都老了或更老了,也有想见的人却永远见不到了,但那些响当当的出版公司还在,知名的大型书店还在,只是经营得并不容易,但只要“还在”,我心中便甚感安慰。

刘振强曾是台湾首屈一指的出版家,我在知名出版人李昕的文章中多次看到他对刘先生的赞扬和推崇,我也在拙著《出版的正反面》中两次引用刘振强先生的事例,致敬刘先生的卓越眼光、远大抱负和脚踏实地。7月10日下午,在台风将来未来之际,我在三民书局幸运地遇到了刘振强先生的儿子刘仲杰。仲杰兄器宇轩昂,谈锋甚健,30年前他们全家在父亲的感召下从美国回到台北,接过老刘先生的班,尽管挑战重重,却坚定不移并雄心勃勃地要将这家知名出版公司和书店带向百年辉煌。今年正逢三民书局成立73周年,而刘振强先生也已经去世近10年。

旅行途中,约稿、写稿、改稿、发稿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六七八月都特别忙,我忙完北京BIBF后就忙江苏书展,忙完江苏书展就忙书博会,忙完书博会后就忙上海书展——不是在书展上就是在前往书展的路上。

这次邀请的两位作者既有共性也有差异:相同的是,他们都是教育出版方面的编辑,写的却是大众出版方面的故事,不同的是,一个是资格老、出版经验长达几十年的社长,而另一个则是刚出道的年轻女编辑。刘社长是我今年到长沙时认识的,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而这位年轻女编辑虽来自凤凰出版集团,可我并不熟悉,只是机缘巧合成了我的约稿作者。我正在加大力度挖掘新人,她正好被我挖到,我如获至宝。就这么巧,他们两位都是从事教育出版的编辑,而偶然的“跨界”经历都使他们产生了从未有过的反应。刘新民社长为程开甲院士口述史图书设计三个开本的故事,是出版人服务大科学家的难得案例,也真切展现出老一辈科学家对出版物极致珍视的动人情怀,而成青青对教育出版与文学乃至其他类型大众出版差异的认识,是我之前思考过却未系统总结过的,她极大地丰富了我对出版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认知和理解。在大众出版和教育出版两个赛道之间切换自如的编辑真的很少,而很多出版单位往往需要同时经营这两种看似无差别实则如鹤鸣般有着巨大差别的出版事业。鸭和鹅虽然都是水游禽类,但差别很大,一个肉质偏寒,一个则偏温。教育出版和大众出版,外人以为都是无差别的出版(如水浒家禽),行业内看却有泾渭之别。两位作者在两个赛道上的跨界经历,对出版人来说极具启发意义。

——主持人 徐海

从事出版工作30余载,我经手的书稿上千部,经历了一座座笔墨山河,其中最触动内心、最难以忘怀的便是《创新·拼搏·奉献——程开甲口述自传》一本书三个开本的温度往事。一纸书香,三度匠心,承载着一位大国功勋的赤诚一生,也见证了出版人始终不变的初心与使命。

《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是湖南教育出版社历时十二载久久为功的文化工程。科学史,是一个民族自立自强的学术根基,更是一个国家不断向前的精神脉络。20世纪的中国科学,从一片空白艰难起步,在风雨坎坷中由弱变强,走出了一条自强不息的奋进之路。但岁月无情,亲历那段峥嵘岁月的老一辈科学家逐年老去,许多珍贵的科研往事、无名的奉献历程,随时可能被时光冲淡,被岁月封存。为抢救即将消逝的科学记忆,留存不可复制的时代精神,湖南教育出版社倾力编纂出版了这套丛书。丛书累计收录了400余位中国科学家与科技工作者的口述史料,字字真实,句句滚烫,屡获业界高度赞誉,已然成为记录中国科技发展史、传承科学家精神的经典文库。

《创新·拼搏·奉献——程开甲口述自传》客观真实地反映了程开甲先生的科学历程与科学人生。先生被誉为“中国核司令”,是当之无愧的共和国无双国士。从第一颗原子弹惊天爆破,第一颗氢弹震撼问世,到此后30余次关键核试验,先生扎根戈壁,坐镇一线,以身铸盾。“两弹一星功勋奖章”、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以及先生99岁高龄时,由习近平总书记亲自颁授的“八一勋章”,三项国家至高荣誉,沉甸甸镌刻着他功勋卓著、报国一生的赤诚担当。作为《20世纪中国科学口述史》丛书中的一本,《创新·拼搏·奉献——程开甲口述自传》也是分量极重、意蕴较深的一部力作。

盛名背后,程先生的口述史记载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沉寂岁月。1960年至1984年,先生悄然从学术界、从公众视野、从家人生活中彻底“消失”,没有发表论文,没有公开头衔,没有

在過去十余年的职业生涯里,我的出版轨迹始终沿着一条清晰、严谨的轨道延展:组稿、审核、编辑加工、校对、付印。作为深耕教育出版领域的教辅编辑,我们的工作锚定课程标准,回应教学需求,每一本书的诞生都有可依的规范、可测的标准,甚至有可预判的终点。编辑在其中更像一个“守门人”——守好知识的准确性、体例的规范性、流程的有序性,待签字付印的落款落下,案头的使命便告完成,后续交由印刷、发行的链路承接。这样的工作塑造了我审慎、细致的职业习惯,也构建了我对“编辑”二字最初也最稳固的认知。它稳妥、可控,带着工业流程般的精准,却也在日复一日的重复中,让我偶尔生出隐约的困惑:出版的边界,是否就止于案头的定稿?编辑的成长,是否只存在于规范的精进之中?

这个问题的答案,以一场意料之外的跨界悄然降临。因一次偶然的选题契机,我接手了作家丁立梅散文自选集的策划与出版工作,并全程参与后续的宣传推广。从B端教辅到大众文学,从闭环式的流程生产到开放式的内容传播,这本书像一把钥匙,打开了我对出版行业更立体的认知,也让我重新丈量了“编辑”这一身份的广度与深度。

其实与丁立梅的文字结缘,远在这次选题之前。刚参加工作,我曾在凤凰书城的书架上偶然翻到她的散文集,几页读罢,便被那种明净细腻的笔触打动。她写草木枯荣,写市井烟火,写寻常人事,总能在细碎的日常里打捞起温暖的光泽,文字里有种安静却绵长的力量。那时候我只是个普通读者,“丁立梅”三个字便成了阅读记忆里一枚柔软的印记。所以当社里提出这个选题时,我几乎没有犹豫便主动请缨,既是出于对好文字的偏爱,也是一名编辑面对优质内容时本能的职业心动。那时我并未预想这场跨界会带来怎样的改变,现在回望,正是这份不假思索的选择,与领导及各位同事的信任托举,让我走出了熟悉的舒适区,完成了一次职业认知的更新。

真正扎进项目才明白,文学出版与教辅出版,看似同属编辑工作,底层逻辑却截然不同。教辅出版的核心是“工具价值”,知识体系是否完备,考点落点是否精准,体例设计是否适配教学,一切都有明确的评判标尺。编辑的工作是校准、是规范、是查漏补缺,所有的加工都指向“正确”与“实用”。但散文不同,它没有标准答案,没有量化指标,它的价值藏在文字的肌理里,藏在情绪的流动中,藏在作者独有的生命体验与叙事节奏里。

过去十余年间形成的职业惯性,起初反而成了一种“束缚”:看到稍显随性的句读,会下意识想要调整得更“规范”;读到留白颇多的表

凤凰书评

寸纸藏忠魂

□刘新民

个人记录。20余载,隐姓埋名,销声匿迹。先生把最宝贵的青春年华、最充沛的人生盛年,贡献给祖国的绝密核事业,默默驻守荒寂苍凉的罗布泊。这片被称作“死亡之海”的戈壁滩,时有黄沙蔽日、狂风不息,盛夏地表灼人,寒冬刻骨冰封。极端恶劣的自然环境,常年独处的孤寂隐忍,涉密事业的重重压力,先生全部默默承受,咬牙扛起。纵使心中牵挂家人,纵使历经千难万苦,先生始终严守机密,缄口不言。于先生而言,家国使命从不是一时的岗位重担,而是融入血脉、贯穿一生的坚定信仰与人生航向。

图书出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我从图书作者熊杏林教授处获悉,百岁高龄的先生时常手持放大镜,一页一页慢慢细读其口述自传,沉静而投入。先生凝望的也许不是纸面文字,而是20余载罗布泊的风沙晨昏,是一次次核爆响彻天地的震撼瞬间,是那段无人知晓、无人见证,却倾尽一生的报国岁月。我听闻先生读书模样,心中五味交织,既温暖动容,又心生敬意。感念百岁老人看字不易,我当即决定,重新排版制作两本三号字大开本《创新·拼搏·奉献——程开甲口述自传》精装版,一本留作社方纪念,一本赠予先生,免去先生用放大镜阅读的辛劳,使先生能够从容品读自己的奋斗人生。

2018年2月,我与两位同事满怀敬意地携带定制版图书到京登门拜访先生。见到专属大字号大开本图书的那一刻,百岁先生满心欢喜,不停翻阅,反复摩挲,眼中尽是质朴纯粹的欣喜。兴致勃勃之余,先生特意拿出1964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珍贵现场照片,与我们分享。新旧光影相映,往昔峥嵘重现,令人瞬间动容。这位历经大风大浪、见证大国重器诞生的世纪老人,一生宠辱不惊,处变从容,此刻却因一册小小的图书,笑得真挚热烈。千言万语凝于心间,唯有热泪默然致敬这份纯粹的家国赤诚。

回到长沙不久,我便收到先生的亲笔来信:“刘新民社长(时为总编辑):贵社出版了我

先生凝望的也许不是纸面文字,而是那段无人知晓、无人见证,却倾尽一生的报国岁月

的口述自传,做得很好,我很满意。为方便我阅读,还专门制作了大字号大精装本,你又亲自送到家里,我很感动……向所有出版参与者表示衷心感谢,谢谢你们付出,让我在百岁之时收到这份珍贵礼物。”一位功勋盖世、阅尽沧桑的大国元勋,看淡一生风雨、荣辱得失,却为一书书籍、一份用心,亲笔致谢,真诚感念。我深深感受到,这不是我们工作有多完美,而是先生极度珍视这段报国岁月,极度看重这份被时代认真记录、郑重留存的家国记忆。这场笔墨与风骨的相遇、文字与初心的相守,成为我出版生涯中,最珍贵、最深刻、最难以磨灭的记忆。

2018年11月17日,先生与世长辞。巨星陨落,山河同悲。当月24日的一个下午,先生之女程淑玉女士致电于我,转述老人遗愿与家人心声:这本自传真实完整记录了先生忠诚奉献、科学报国、创新拼搏的一生,是先生晚年最喜爱、最珍视的书籍。家人希望我们做一册小开本,随先生骨灰归葬罗布泊,长伴英雄,朝



夕相随。我听罢肃然。我想,这是对这套书的最高肯定和嘉奖,也是我们出版人的莫大荣耀,更是一份生生不息的精神传承。我决定,不仅要更进一步地精细编校,精工印制,还需要做些防潮防腐保护处理。戈壁风沙凛冽,昼夜温差极大,即便少雨,亦多潮气侵蚀,绝不能让岁月风霜磨损这位大国功臣的半分风骨与半生荣光。以出版匠心守护英雄遗愿,是我们的敬意,更是我们的本分。

2019年5月11日,一册装帧精致、耐存耐久的64开本《创新·拼搏·奉献——程开甲口述自传》,随先生骨灰一同长眠于新疆罗布泊马兰烈士陵园。

当年,先生以身许国,戍守戈壁,以一生默默守护山河无恙。如今,我们以笔墨为念,以书本为寄,伴先生归于魂牵梦萦的大漠故土。风沙年年不息,书香岁岁留存,英雄长眠于此,精神代代相传。

(作者系湖南教育出版社社长)

遇见一本好书,完成一次成长

□成青青



从“内容生产者”到“文化摆渡人”,这是行业发展对编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编辑职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达,会本能地想补充得更“周全”。可一次次通读下来,我渐渐明白,文学编辑的核心,从来不是把文本改得“标准”,而是要守住作者的文气与风骨。那些看似“不规范”的标点,或许正是情绪停顿的呼吸;那些看似“闲散”的笔墨,或许正是意境铺陈的必要。我开始试着放下“校正者”的姿态,学着走进作者的精神世界,去感知文字背后的温度与心意,在尊重创作底色的前提下做细致的打磨。

这个过程是缓慢的,却也是扎实的。它不是对过往经验的否定,而是让我对“编辑加工”有了更丰富的理解:严谨细致永远是编辑的底色,但面对不同的文本,需要匹配不同的眼光与分寸。教辅编辑的严谨,让我守住了文本的底线;而文学审美上的学习,则让我触摸到了文字的灵魂。

二

如果说案头的编校是对编辑认知的缓慢重构,那么第十六届江苏书展上的新书发布会暨签售见面会,则让我真切触摸到了一本书的生命力,完成了一次从“纸上”到“现场”的认知冲击。

活动当天清晨,展馆还浸在半醒的宁静里。顶灯次第亮起,像慢慢展开的纸页,逐次照亮林立的书架与码放整齐的图书。我站在舞台侧边,手里攥着反复核对过的主持台本——这一次,我不仅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还要兼任活动主持人。指尖划过纸页上的环节标注,心里既有筹备多日的笃定,也有一些难以言说的恍惚:过去十几年,我的工作始终在屏幕与稿纸之间,书是案头的工作对象,读者是遥远的终端。而此刻,我正真实地站在书与读者的中间,要把那些在深夜里反复打磨的文字,亲手递到读者面前。

活动开场的话音落下时,某种奇妙的化学反应也随之发生。当丁立梅老师站在台上,用和她文字一样温软质朴的语调,讲起写作里的日常、生活里的微光时,台下的喧闹慢慢静了下来,有背着书包的学生前倾着身子听得入神,有陪着孩子来的家长轻轻点头,也有逛展路过的读者停下脚步,站在人群外围静静聆听。没有刻意的煽情,没有喧哗的造势,只是文字背后的作者走到了台前,把创作的心意娓娓道来,整个现场便形成了一个沉静又饱满的场域——舞台不再只是发布活动的载体,而成了作者、作品与读者三方精神共振的空间。那一刻我忽然明白,我们在案头反复斟酌的每一个句子,每一处停顿,最终都要落到读者的心里去。文字印在纸上只是完成了物理形态的出版,只有当它和人的生命经验发生碰撞,唤起共情与得到回响,才算真正完成了精神层面的抵达。

这种感受在签售环节变得愈发真切。在教辅出版的语境里,读者与书的连接大多是隐性的、功能性的——一本书被购买、被使用,直到被完成使命,编辑很少能直接听到读者的反馈。但文学作品的读者,是带着自己的故事来的。有年轻的姑娘捧着书说,丁老师的文字陪她度过了最难熬的备考时光,有中年读者说,读这些散文让他重新注意到了楼下的花、傍晚的风,找回了对日常的感知力,还有不少学生排着队,小心翼翼地递上书,说自己在作文里引用过书中的句子。这些话语都不在预设的台本里,却成了整场活动最珍贵的注脚。

待到最后一位读者道谢离开,展馆渐渐恢复平静,我站在空下来的舞台边,心里久久不能平复。过去我始终以为,付印是出版工作的终点,那天我才真正懂得,签字付印从来不是结束,一本书真正的生命,是从抵达读者面前的那一刻才开始的。

三

从书展现场回到日常的编辑岗位,这场跨界带来的思考仍在延续。它不只是一次业务范围的拓展,更是对编辑职业内涵的一次深层刷新。

首先被打破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标准答案”思维。教辅出版的训练,让我习惯用精准、规范去衡量一部作品的价值,但文学的魅力恰恰在于它的模糊性与开放性。一部好的散文,不需要被定义,也不需要被量化,它的价值在于能否触动人心,能否在读者的精神世界里留下痕迹。编辑要做的,不是把作品打磨成统一的标准件,而是尊重文字自身的质感,守住作者独特的文风,让作品以最本真的面貌走到读者面前。这是对文学审美能力的考验,更是对编辑包容度与分寸感的修炼。

其次被重构的,是对出版全链路的认知。在教辅出版的成熟体系里,编辑的工作大多集中在生产端,发行与销售有专门的团队承接,编辑与市场之间隔着清晰的边界。但一般图书的出版,是一个从内容生产到传播落地的完整闭环。一本书的生命力,不只取决于内容的完整性,更取决于它进入公共阅读空间后的抵达率。从前期的市场预热、渠道沟通,到样书投放、宣传节点配布,再到线下活动的策划执行,这些都是过去的职业训练里鲜有涉及的内容。

这段经历让我明白,新时代的编辑早已不能只做案头的“工匠”。我们既要能沉下心来打磨内容,也要能抬起头看向市场;既要能守住文字的品质底线,也要具备把好内容递到读者面前的传播能力。从“内容生产者”到“文化摆渡人”,这是行业发展对编辑提出的新要求,也是编辑职业成长的必经之路。

回望这近一年的跨界历程,从选题策划到编校打磨,从装帧设计到宣传落地,一本散文集的出版,像一面镜子,照见了过往职业经验的长与短,也拓宽了我对出版事业的认知边界。十余年的教辅编辑经历,教会我的是严谨、是规范,是对知识与读者的敬畏心,这是编辑职业的根基,从未过时。而这次文学出版的尝试,则让我看到了出版更柔软、更广阔的一面——它不只是知识的传递,更是情感的共鸣和精神的连接;它不只是一套标准化的流程,更是一场关于思想与生命的相遇。

有人说,做书是一场修行。于我而言,这场跨界便是一次修行里的顿悟。原来编辑的成长,从来不是在熟悉的轨道上循环往复,而是要敢于走出舒适区,在新的领域里重新学习,重新建构。我们在打磨一本书的同时,也在打磨着自己的职业认知;我们在帮一本书抵达读者的同时,也在不断抵达更完整的自己。

出版之路漫长,有幸能在这条路上,遇见一本好书,完成一次成长,便已是职业旅途里珍贵的馈赠。

(作者系江苏凤凰教育出版社副编审)